1

本章我们将学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也就是1949至1956年这七年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恢复了国民经济

建立并巩固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公布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宣布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到1956年

我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 个体手工业

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

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

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

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

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系列紧迫的问题

第一个考验是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 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

国民党败退时在大陆留下了100余万军队

200多万政治土匪和60多万特务尚待肃清

在中国的广大城乡

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势力仍然势力庞大

在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

土地改造工作也有待完成

第二个考验是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新中国接受的是一个极端凋敝

千疮百孔的破烂经济摊子

据统计 1949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减少四分之一

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

物价上涨 市场混乱的状况依然十分严重

大量的失业人员需要安置和救济

全国共有失业工人122万多人

失业知识分子18.8万多人

全国所有铁路 公路

几无一线一段能够通车

1949年的自然灾害也很严重

全国需救济的灾民约4000万人

1949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7美元

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第三个考验是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建国初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

通过政治孤立 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企图扼杀新中国

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

仅有25个国家承认了新中国

美国还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案

在美国的拉拢和压服下

到1953年3月

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

美国还直接出兵干涉朝鲜问题

威胁中国东北的边境安全

第四个考验是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

告诫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

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

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1949年3月23日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上车前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今天是进京‘赶考’嘛

进京赶考去 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

周恩来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不要退回来 ”

毛泽东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可以说 “进京赶考”是中国共产党人

所要面对的一道最大的考验和难题

针对上述这些严重的困难和问题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

以便为开展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

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1951年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中国大陆的解放任务基本完成

在此基础上普遍召开

各级各届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

建立了在全国范围内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权

使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1950年至1953年春

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

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解放农村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1950年4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

1950年至1951年

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

长期危害人民的200多万土匪也被肃清

社会的整体秩序和人民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第二 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围绕经济恢复这一中心

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到1950年3月

基本制止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以1950年3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

到1950年12月为85.4

1951年12月为92.4

1952年12月为92.6

全国物价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结束了自抗战以来

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

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

为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顺利起步的条件

对于官僚资本进行没收

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奠定了经济基础

到1952年底

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工农业产值均超过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最高水平

第三 巩固民族独立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

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

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

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

收回了自19世纪50年代起丧失的海关治权

在外交上

提出了“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1950年2月与苏联订立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规定了双方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

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在军事上 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

并迫使美国接受停战协议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

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第四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1950年和1951年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 整党运动

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

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军机关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初 又在全国大中城市

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行贿 偷税漏税

盗骗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

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的

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即“五反”运动

这些举措对于中国共产党

在执政条件下保持革命精神

促进自身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

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

上述工作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

有力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

广大劳动人民真诚地拥护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一些曾经对新中国 新政权

新道路抱有某种疑惑

观望态度的人开始相信

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这些成就的取得

为领导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2

即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

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没收官僚资本

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

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展开

并于1952年基本完成

中国的官僚资本

是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

它是官僚资产阶级依靠超经济的特权

在剥削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

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

到 1950 年初

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 2 800 余家

金融企业 2 400 余家

这些企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 具有两重性质

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

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

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

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

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

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

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和

原官僚资本企业的民主改革

生产改革工作的完成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 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

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

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2年 私营工业产值的56％

已属于加工 订货 统购 包销部分

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

被削弱以至淘汰

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

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比如 1949年 国营占33.4%

私营占62.7 %

1952年 国营己占50% 私营降为42%

第三 引导个体农民

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 年

全国已有 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

少数农户还参加了

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开始了

这些事实表明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

独立的社会形态

它本身具有过渡的性质

1953年2月4日

周恩来曾在向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稿上写有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

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 ”

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

毛泽东认为 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

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确立是很难的

他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 ”

1954年9月15日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出深入的论证

他认为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在我国 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

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 就是既有社会主义

又有资本主义 ”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

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都已经占据领导地位

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

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

“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要它不变 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

“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的光明大道可走

而且不能不走

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即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

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

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进行经济建设

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

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

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

以及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都很低

与苏联存在差距

另外 1952年

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

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 甚至落后于印度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 但是 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也不能造 ”

发展工业

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是摆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从 1953 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

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 煤 电力 石油

机器制造 飞机 坦克 拖拉机 船舶

车辆制造 国防工业

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

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

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

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怎样才能发展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从世界历史上看 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这是欧洲各国 美国和日本走过的

而且走通了 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这是苏联走过的

而且也走通了 十月革命前

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

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从19世纪60年代末

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

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

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

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

到1949年

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

20.08亿人民币(以1952年的币值计算)

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就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

这样 中国就会成为

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

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经济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

但终究还是要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

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

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

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4

就要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这是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的奋斗目标

并且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 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

决定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

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前

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

当时的设想大致是 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工业发展了 国营经济壮大了

就可以采取

“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

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

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952 年 9 月 24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

我们要在“十到十五年 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

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刘少奇 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

“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的设想 这种认识上的改变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

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52年 6月 在“三反”

“五反”运动行将结束

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

毛泽东即指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

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

这说明

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已经成为必要的了

另一方面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

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 ( 即生产关系 )

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种变化 用周恩来的话说

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

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

这说明

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

变化了的实际的情况出发

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

开始酝酿并与1953年正式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明确规定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

对手工业 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 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

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

“好比一只鸟 它要有一个主体

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它又要有一双翅膀 这就是对农业

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

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

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从 1953 年开始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主要是因为

第一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

相对来说比较强大

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发展工业 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

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

和工业建设的初步开展

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与私营工业相比

国营工业规模大 技术设备先进

拥有轻重工业

并且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也优于私营企业

因此国家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

发展国营工业变成为当务之急

建国初期的工业建设的发展

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

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

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 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

发展困难 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

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

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

就更加重了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

应当说 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也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

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

成本高 资金不足

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就必须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产品的质量

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

培养技术人才 积累资金

而要如此

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 1952 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

更使我们认识到

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

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

资本主义工业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

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 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是保证工业发展

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

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

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

但是 由于实行个体经营

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为个体农户耕地很少

经营规模十分狭小 生产工具严重不足

资金十分短缺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

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

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

播种 收获

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等

都有很大的困难

更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许多农产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1949 年至 1952 年

农业生产发展较快

但在 1953年至 1954 年

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了

这说明

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

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

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

轻工业原料

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

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在 1955 年下半年

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当时作出

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

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开展

城市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

这就要求尽快增产粮食

使国家能掌握足够的供应城市

工矿区的商品粮 同时

还要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

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

中共中央作出大搞农业合作化的决策

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

对我国农业状况及农业增产途径

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其目的在于通过搞合作化以增产粮食

从而适应国家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 当时的国际环境

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

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

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

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

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

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

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

这种国际环境

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为了论证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

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胡乔木同志在1989年写过一篇文章

指出 “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

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 ”

“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

重要的是 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

保留多少私有成分

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

具备多大程度上应有的灵活性

总之 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

通过这一历史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

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

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5

一方面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

在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953 年

新中国即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际上

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

在1951年就已着手进行

1952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编制1953 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

1953 年 4 月 中央批准下达

1953年计划提要 “一五”计划的编制

历时四年 五易其稿

到 1954 年 9 月基本确定下来

1955 年 7 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了这个计划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 计划规定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 轻工业 农业和商业

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计划规定

五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

766.4 亿元 折合黄金 7 亿两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没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

不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

进行这样巨额的投资是不可想象的

“一五”期间 在苏联的援助下

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

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鞍山 包头 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到 1956 年

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

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

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

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

1957 年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

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 青藏 康藏

新藏公路建成通车

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

限额以上的项目(建设规模所需总投资额超过或等于某一规定限额的建设项目)

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竣工

全国城乡呈现出一派建设的繁忙景象

当时建成的这些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

都是国家统一规划 统一投资的国营企业

这些建设成就

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

为顺利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一五计划大大推动了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从1952 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

跃升到 1957年的 1 068 亿元 财政收入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 发电量 货运量

等重要指标也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社会主义改造也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

到1957 年应达到的指标

在 1956 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6

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

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

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 耕畜和资金

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

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

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

针对这种情况 党和政府决定

不待农民在土改中

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

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

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 教育

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样 在土改后

互助组很快就在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发展起来

然而 在工业还不能向农村大量

提供农用机械的情况下

互助组能不能前进一步

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呢

这在当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1951年4月17 日

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写报告

反映农民自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

导致互助组陷于涣散

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

通过增强新因素

去“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

“对于私有基础 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

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

消弱它直至否定它

办法是在互助组内

逐步提高按劳分配比例

出组不许带走公积金”

华北局和刘少奇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

刘少奇认为

“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

条件不成熟

在落后小农的互助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这是一种错误的 危险的

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 毛泽东则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毛泽东研究了世界现代化

大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农村的实际需要

认为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

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

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

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

则中国的合作社

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

去动摇私有基础 也是可行的 ”

毛泽东的看法说服了刘少奇

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 草案 ) 》

草案指出 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

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

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

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3 年国家对粮食 棉花

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也就是“统购统销”）

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

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 大力发展供销合作

削弱城市资本主义

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

大力发展信用合作

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

这样 既保证了人民对粮食 棉花

油料等的需要

又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 1953 年 12 月通过的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

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

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

第一是互助组

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土地及牲畜

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

统一经营 有较多的公共财产

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

统一经营 集体劳动 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

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

是正确的

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其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 在中国的条件下

可以走先合作化 后机械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

及时将“组织起来”

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 充分利用和发挥

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

通过互助组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

实行积极发展 稳步前进

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 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

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采取典型示范 逐步推广的方法

发展一批 巩固一批

第四 要始终把是否增产

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 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

国家应努力用

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正是在前述方针的指引下

农村的互助合作积极

稳步地向前推进

到1954年底

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0多万个

发展到近1000万个

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

增加到1953年的1. 4万个

1954年秋为10万个

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

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

从1951年底的2 100万户

增加到1954年底的7 000万户

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

从19. 2%增加到60.3 %

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1955 年夏季

由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不同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引发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

7 月 31 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

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

基本方针 基本政策

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

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

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是继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之后

又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献

但是毛泽东在报告中

不点名地错误指责由邓子恢主持的

中央农村工作部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是站在群众运动后面指手划脚的

“小脚女人”

从而将正常的党内争论

说成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会后 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计划地加速发展

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到 1956 年底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

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 87.8％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尽管如此 农业合作化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

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

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8％

农民安居乐业 生产有所发展 生活有所改善

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

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

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

社会变革 社会进步

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

如何采取更有利于调动

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

并且需要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不断的加以完善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

稳步前进的方针

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

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

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步骤是从供销入手

由小到大 由低到高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

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

也极大地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

我们以地处崇文区灵官庙的万盛祥刀铺为例

来看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和发展的过程

1955 年底

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

实际上 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

分批 分片改造的办法

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

到 1956 年底

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

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 ％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7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开始积极推进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

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对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是把他们作为敌人

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

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

民族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

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

又有拥护宪法

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对民族资产阶级 是把他们作为朋友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

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

什么是赎买呢

就是在过渡时期中

工人阶级为了本阶级及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

争取对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企业进行和平改造

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付出一定的代价

为了和平地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

工人阶级必须自觉地

忍受一个时期的一定的剥削

这种剥削的性质和一般意义的

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是不同的

因而把它叫做对资产阶级的赎买

采取这样的政策

既可以在一定时期

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

如增加产品供应

扩大商品流通 维持工人就业

为国家提供税收等

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在中共中央酝酿并提出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

1953年2月 毛泽东提出

对民族资产阶级 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同年春 统战部长李维汉在武汉

南京 上海等地调查后

向中央提出了关于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

提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

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

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同年6月 政治局会议确定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

随后又确定对私营商业也搞国家资本主义

同年9月 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

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明确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

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

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

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

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

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

实施公私合营以后

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

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

已经深入到企业内部的生产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 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

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1954年1月

随着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意见的出台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

开始时 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在这种合营企业中

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

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

即分为国家所得税 企业公积金

工人福利费 股金红利四个部分

1955年 合营工业产值

已接近全部私营工业产值的一半

北京 上海 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

全行业公私合营

这时

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

以核实私股股额

在合营期间

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

这就叫定股定息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

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除资本家领取定息以外

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

1956年1月

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

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

到这年年底

全国私营工商业主的绝大多数

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

这是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设想

十月革命后

列宁打算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

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

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

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

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

所有制改造刚一付诸实施

资本家们就争先恐后地

甚至是敲锣打鼓地

把他们的工厂企业统统送给了政府

结果 原来计划要10到15年

才应当完成的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转瞬之间就轻松实现了

在赎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资本家先后共获得人民币32.5亿元

超过了其原来所有的资产总额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

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

许多人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

这既有利于发挥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

可以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

国家还安排他们进行学习

和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

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

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许多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合社会主义制度

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火柴大王刘鸿生说

“企业合营以后 国家给了5厘定息

国家的赎买政策 已经是太宽大了

我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我在北京参加工商界第一届执委会时

曾听到毛主席关于工商业者

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 你想想

我能违反社会发展规律

叫子孙再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吗 ”

钢铁巨擘胡子昂说

“放弃剥削 不怕共产 前路那样光明

一张选票 一个饭碗 安排如此周到 ”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这个胜利的取得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

执行了毛泽东同志

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

同时

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

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

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

8

人民民主政治建设

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得到了全面确立和进一步发展

1954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宪法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

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

即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制度

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等几个重要的法律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逐步加强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以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不再代行全国人们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及时指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人民政协要继续发挥

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作用

1954年12月

政协全国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明确规定 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

各民主阶级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

仍然需要存在”

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1956年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中国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

到1956年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

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

合计为92.9%

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

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

这表明

中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

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得到了全面的确立

原计划用18年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际上只用了7年时间

由于进展急促 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1955年夏季以后

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

个体商业的改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也有急于求成的缺点

小商小贩 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

本来是应当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

却把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带进了合营企业

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此外 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上

和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上也有局限性

尽管如此 从根本上说 对于个体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

一场伟大的变革

是符合客观需要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道路

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

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

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

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 现代化建设

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

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

正是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

现代化事业 为中国以后

一切的进步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

进入社会主义的

一方面

当时的中国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

再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

所以可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或者说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是不可能越过这个阶段的

9

我在您讲授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开始部分有一个疑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在新政协会议上通过的

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

却没有明确写入新中国的

“社会主义前途”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毛泽东不是早已说过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

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

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吗

那么 为什么在这个

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新中国的建国纲领中

不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呢

这个问题啊

当时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周恩来

曾经作过说明

他说社会主义

“这个前途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的 但应该经过解释

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

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

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

才会真正的承认它

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

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 不是说是否定它

暂时不写出来 不是否定它

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

《共同纲领》没有写上社会主义

体现了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议上

对起草《共同纲领》提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

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也就是说纲领要集中表达

现阶段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和中心任务

应当成为现阶段党和政府工作的行动纲领

正如我在课上提到的

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啊

显现的是一个万象更新同时又百废待举的局面

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

充满了对新社会 新生活的热情和企盼

同时又要面对如百棘丛生般的种种困难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

要担负肃清国民党残余军事势力

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

将各阶层群众组织在各种社会团体中

准备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

扫除旧的社会污习等等一系列的任务

更要面对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经济

休养生息 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严峻考验

所以 困难重重 先做好当下的事 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 在建国初期

实际上 中央领导层

对由新民主主义社会

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 也并没有明确

我记得我看过一份材料啊

是说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询问

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呢

他回答 过渡到社会主义

“大概二三十年吧”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为什么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

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恩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

现在很多人所持有的

例如“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

以及有些人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提早结束

而感到惋惜 这样一些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

这种观点实际上有点

以今度古的意味 当我们回到历史

我们会看到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

新民主主义都很难持久

提早结束 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

您说的这个自身逻辑是指

你知道 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

设计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时候

它本身是个过渡性的阶段 过度性的东西

在党内 始终存在一种倾向

就是想早一点结束新民主主义

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种倾向在我们党内是有相当大的基础

为什么会有相当多的人持这种观点呢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变通的理论

过渡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时提出两个前提

第一是需要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

第二是老百姓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

需要一个使大家适应的过程

这两个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

但是 你要知道

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

始终是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的

在新民主主义的存废问题上

真正对毛泽东起作用的 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

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一种估计

这是决定他取舍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相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其他一切都是过程

都是策略性的

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和力量对比的估计

您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

恩 具体放到历史的脉络中呢

也就是有三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 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担忧

当时在农村 土地改革后

两极分化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

农民如果靠个人发家致富了

他就可能不会向往社会主义了

党在农村的力量就可能会发生动摇

第二 是力量对比的变化

你知道 1952年土地改革之后

可以说 已经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对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提出挑战了

这时 国有工业企业所占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67%

毛泽东说 资本主义经济

“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

离不开共产党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

国家重工业化的需要

从逻辑上讲

国家工业化能不能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内推行

看你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

如果选择从轻工业开始

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

而如果选择优先重工业的“赶超型”的工业化

那么必然会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

可以说 正是上面这三个因素的存在和变化

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依据它自身的逻辑

必然会提前结束

可是 老师 就我所知

党内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其实也并不是一致的

比如说刘少奇就提出

“剥削有功”

实际上便是稳住资本家

鼓励他们进行生产

是 刘少奇确实这么提过

但是在这里你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 刘少奇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

刘少奇到天津之后

因为接管城市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就是资本家停工停业 转移资产

他要稳住资本家

从那以后 刘少奇的思想有一个变化

第二 刘少奇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

刘和毛之间 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应该说不是一种路线的分歧

不是类似斯大林和

布哈林那样的路线斗争的那种分歧

可以说

当时在中共党内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很清晰的

就是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就是苏联的模式

所以刘和毛的分歧是步骤性的

而不是目标性的

实际上 他们俩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翁老师 1955年下半年起

席卷5亿农民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迅猛兴起

我课下查阅到 这个高潮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初级合作化 二是初级社升高级社

三是小社并大社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

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呢

邓小平曾讲过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

很了不起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当然缺点也有 从工作来看

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

我举得这个评价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上也非常合适

一方面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使得5亿多的个体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把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了集体公有制

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

整个人类历史上 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合作化高潮出现以前实行的典型示范

逐步推广 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

自愿与互利 说服与示范和国家的帮助相结合

边发展边整顿和巩固

既注意数量又注意质量

既反对放任自流

又反对急躁冒进等做法应该说都是很成功的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

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这种强大的声势

并切从根本上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

乡村富农和小农经济的联系

因而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和城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应该说 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存在不足

主要就是1955年下半年掀起高潮以后

对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正确的方针

原则 做法 没能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

在错误的反“右倾”的口号下

压制了不同意见 只追求数量和速度

不注意质量 一五计划4年完成

“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时期内遗留下许多问题

特别是遗留问题尚未来得及逐一克服之时呢

农业合作社又被更高一级的人民公社所代替

生产关系背离生产力水平那就更远了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周见